

近60年来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演进与述评^{〔*〕}

陈业新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始于1960年代,1990年代后进入全面兴起阶段,2000年以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海外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具有成果丰繁、目的多重、对象广泛、结论多元等特征,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具有推动之功。但由于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社会体验、价值判断等因,海外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又存在研究不够深入、论证不足、论据欠充分等问题,致使其有关结论深值商榷。而且受“环境破坏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海外研究者还在中国环境史的某些判断或结论上,存在缺陷乃至需要高度警惕的偏见,国内环境史研究应在吸收、借鉴海外研究成果的同时,加强和深化中国环境史研究,构建并掌握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话语权,用中国环境史本土话语影响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

〔关键词〕学术话语权;学术史;海外研究;中国环境史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8.018

环境史即环境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1990年代后,随着国内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海外与中国环境史研究相关的著述陆续通过译介而引入国内,对推动国内环境史研究具有积极之功。然而,对于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初起于何时和因何而起,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以及就当前大陆学界的环境史研究来说,海外的研究有哪些问题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等等,学界迄今尚无专门条理者。^{〔1〕}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愚陋,以蠡挹海,对196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学界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梳理,并就相关问题略加浅尝辄止式的述评,以期对深化国内环境史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欧美等西方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概述

(一)早期研究

1960年代中期,环境退化成为工业化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全球环境日益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对此也有及时的应对:陆续出现如环境经济学等新的研究领域或方向,^{〔2〕}并在美国率先出现了当下所谓的环境史;^{〔3〕}加强对各个国家、地区的环

作者简介:陈业新,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历史地理视野下的芍陂水资源环境变迁与区域社会研究”(18BZS164)的阶段性成果。

境研究,中国则为其一,并逐渐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新热点,其中不乏历史环境的主题。^[4]

海外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也大概滥觞于欧美。相对较早者为墨菲,其《中国的人与自然》一文认为,过去的 3000 年,“中国人通过逼近自然和集约开发,改变了他们的环境,改变的规模很可能比本世纪之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环境的改变都大”。^[5]此后,美籍华人段义孚就中西环境态度、行为差异,以及传统中国农业扩张、城市建设导致的森林砍伐和《周礼》林木资源等保护进行了讨论。^[6]新西兰布坎南关于中国土地的研究专著则对包括新中国初期在内的土地开发、利用史进行了考察,其中涉及如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人口的流动与环境变迁等环境史内容。他认为过去的 20 年,“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人与气候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成为‘生态主导者’”。^[7]但其“符合当代中国思想的重要论点”,因与西方主流认识不相吻合,加之作者的观点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证明”,这一研究受到了署名书评的批评。^[8]1978 年,美国埃克霍姆在其世界粮食生产系统毁坏的研究中,对历史上中国的林木毁坏进行了粗略的陈述,并就 1949 年以来中国在“森林更新”方面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显著进展”予以了肯定,称这种“令人鼓舞的努力”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五千多年森林不断恶化的情况”。^[9]比尔斯基的论文就中国早期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军事战争、林木损坏、灾荒等事关环境变动及应对情况进行了讨论,认为中国在前 4 世纪后存在一个持续性的生态危机,秦国的脱颖而出则较好地控制了危机。^[10]1983 年出版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6 卷第 1 分册,专门考察了《管子》中记载的生态学和植物地理学。^[11]1987 年,濮德培出版了基于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地力耗尽》学术专著。^[12]尽管其研究重心为明清区域社会治理,但其中较多涉及人口、山川河湖变迁、水利建设、土地利用、自然灾害等内容,濮德培及该著因此被伊懋可认为是西方早期研究中国环境史的“核心”学者和“为数不多的优秀专著”之一。^[13]1989 年,休斯发表孟子关于中国环境问题处方的论文,对孟子环境主张进行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孟子环境思想的价值在于,他将源于其实践经验、儒家对人类价值的关注,以及道家人与自然合一的意识结合起来而提出了非常有用的建议”。^[14]1990 年,有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最重要的先驱学者”之誉的伊懋可发表《中国环境史:观念的议程》,就中国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构想,认为“中国环境史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富饶前沿”,强调技术之于环境史研究的意义,可以技术为中心,探讨如气候、地貌、海洋、植物、动物等变迁脉络和环境变化形态。同时,他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环境史研究值得关注的如不同技术和生态类型的水利系统多样性等五个重要主题。^[15]

总的看来,1990 年及其前的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说明中国环境史尚未受到海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专门性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不多,如段义孚、濮德培的研究即各属人文地理、社会经济史著述。^[16]成果形式方面,多为学术论文,尚无有分量的环境史专门著作。由于普遍对中国环境史料缺乏了解,以及对中国历史环境知之甚少,相关研究不够深入,论证也欠充分,论据主要源自西方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而且有关话语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其研究目的,并非为厘清中国历史环境的真实情状,而是借中国经验之名为其政治或社会变革、环境治理等主张或方案提供支撑。^[17]

(二)全面兴起阶段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变化显著,但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城市大气污染严重、工业“三废”排放增加、乡镇企业环境后果突出,^[18]中国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9]“环境与发展”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冲突”,^[20]历史学者甚至发出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今天已恶化到可怕的地步”的呼声,^[21]海外学界也对中国环境高度关注,在全球史兴起的背景下,^[22]中国环境史成为海外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其研究进入全面兴起阶段。

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全面了解并逐渐熟知,当始于 1990 年代。1993 年底,“中国生

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在香港召开,与会论文乃后分别出版了中、英文论文集。中文版论文集收录了27位作者的论文,除6位中国台湾作者外,其余如麦克尼尔、墨菲、马立博、伊懋可、斯波义信等均来自欧美和日本,讨论主题有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气候变迁、环境思想等。^[23]1993年,伊懋可发表了其广为学界熟知的中国“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论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因“技术锁定”而不可持续。^[24]

此后,海外有关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成果陆续涌现:1994年,孟泽思出版《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1997、1998年,哈佛大学组织了“儒学与生态”等3场主题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最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分别结集行世;1998年,马立博关于明清岭南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的专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5]是年,剑桥《中国季刊》杂志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联合主办了“中国环境”的主题研讨会。该杂志第156期“中国的环境”特刊收录了此次会议的12篇论文,其中除中国学者刘昌明的《环境问题与南水北调》一文外,其余均为海外学者所作。其研究的议题,主要为环境意识、水资源危机、人口与公共健康等中国当代环境问题,唯有伊懋可的环境史论文例外。伊文为该期杂志刊发的第一篇论文。这一安排,用杂志编者埃德蒙兹的话说,就是“为了了解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历史根源,试图向“那些对当代中国环境感兴趣的人”证明,“环境问题对中国来说并不新鲜”,“中国过去曾多次将经济增长推到可持续极限之外”,“在现代之前,中国部分地区的环境严重退化”,并以中国“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寻求自然的短期回报”事例警醒世人。伊氏在其文中强调,中国历史从其始就与环境“交织在一起”,要充分理解中国历史的“大多数长期模式”,环境因素“至关重要”。在他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使传统中国“以权力为导向的行动方式可能取得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成功”。然而,为发展精耕细作农业而对土地几乎无休止的改良、为稳定农业生产而兴修形态不一的水利工程,以及为满足生活薪柴和建筑用材而砍伐森林等“过度开采资源的短期回报”行为,“往往会减少在特定技术水平上以可持续的限度限制开采的任何倾向”,削弱了“对过度开发环境的限制”,导致“支撑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设施”遭受损害。伊氏由此认为,“中国的景观是前现代世界变化最大的景观之一”,因此“到了现代之初,其环境在许多方面都严重恶化,均并非偶然”。^[26]

在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日盛背景下,一些考察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述也开始对环境有所关注,并将之作为其内容的一部分。如1998年伊懋可在对其与人合撰并在1983年付梓的《中国文化地图集》进行修订时,就在第一部分原有的“土地和人民”内容外,专门增加了“自然环境”的内容;剑桥大学鲁惟一等《剑桥中国上古史》一书,也专设了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吉德炜撰写的“中国古代环境”内容。^[27]尽管二者篇幅甚小,内容相对简单,研究性也不够,但折射了海外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环境对研究中华文明的意义和重要性。

2000年以来,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具体有夏竹丽的《毛泽东对自然的征战》(2001)、易明的《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2004)、伊懋可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2004)、李明珠的《华北的饥荒斗争:国家、市场与环境退化(1690—1949)》(2007)、穆盛博的《渔业战争与近代中国的环境变化》(2009)、马立博的《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2012)、佩兹的《黄河:蜿蜒中的现代中国》(2015)、张玲的《河流、平原与国家: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戏剧(1048—1128)》(2016)、丹尼尔·加德纳的《中国的环境污染》(2018)、孟一衡的《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2020)等等,其中如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等已被翻译为中文出版,学界评价甚高。^[28]这些研究,除少数外,其研究者主要来自美国,究其因,殆与所谓的“环境史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分支学问很可能首先植根于美国”有关。^[29]

二、日本学界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

日本学界也“持续关注”中国环境史研究。^[30]根据其情况,可将其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一)2001 年以前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用力甚深,土地开发、水利建设、国家财政等素为其研究重点。在加藤繁、增渊龙夫、佐藤武敏、森田明等有关传统中国山林薮泽与水利开发、税赋征收等研究成果中,部分涉及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内容。^[31]1970 年代以降,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环境法制和政策问题;自 1990 年代始,日本学界全面致力于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中国环境研究,对环境的“历史渊源”即环境史的“关注也显著提高”,并“有所进展”。^[32]此间研究中国环境史的日本学者主要有原宗子、上田信,以及年轻学者村松弘一等。^[33]不过,在环境史只是社会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而无“实质”意义的认识影响下,东瀛专门研究中国环境史者相对偏少,且其研究“大都趋向于对‘环境破坏史’特别是‘森林破坏史’的研究”。^[34]但原宗子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她根据《管子·地员篇》《商君书》记载,认为先秦时期,以华北开发为中心的中国农业发展存在齐国《管子》、秦国《商君书》两种模式。前者根据土壤、植被等自然状况,以麦作种植为基础,因地制宜地发展林业、丝麻、渔猎等多种经营,多种环境的基本面貌得以保持;后者则是在“农本主义”的支配下,秦国实行“大田谷作主义”,将山林丛泽草原耕地化、非农耕民农民化,“华北的环境面貌开始改变”。秦一统天下,“农本主义”走向全国,并在西汉趋于成熟。汉武帝以后,中国农业朝着内延扩大的方向发展,依靠精耕细作、施肥而保持地力常新,从而形成肥沃的人工土——壤土。因此,中国“农本主义”支配下的农业经济环境“负荷”较少,有利于“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持续发展”。^[35]这一结论,与伊懋可的中国三千年“不可持续增长”认识大相径庭。日本学者杉本宪司就此而认为,过去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多关注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粮食生产的提高等,这种以社会发展指标为中心的研究方式缺乏对环境要素的具体考察,不足以全面考察中国古代的环境变迁,原宗子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36]

(二)2001 年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通常简称“地球研”)设立后的研究

首先是地球研的项目式综合研究。根据介绍,该所是“为推进综合性研究项目而设立”。所谓的“综合”,就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问领域综合化”。^[37]地球研先后立项几十个综合研究项目,2006—2022 年完成研究者共 38 项,其中至少 9 个项目的研究对象与中国环境史相关。具体如中尾正义的《绿洲地区对水资源变动负荷适应力的评价及其历史变迁》、福嶋义宏的《近期黄河水循环的快速变化及其对环境的影响》项目,就分别考察了中国西部黑河流域过去 2000 年、黄河流域 1990 年代的人类活动与水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38]其次是 2004 年初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与地球研等联合举办的专门研讨中国环境变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大地的影响:中国近期环境史”。根据介绍,会议研讨的主题十分广泛,包括林木利用及其变迁、农业生产与可持续性、绿洲现代农业及其影响、草原沙漠化、三峡大坝等。与会者分别从中国环境问题的评估、形成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等几个方面,对会议主题进行了讨论。尽管参会学者来自包括中国、日本、美国、瑞典、西班牙、澳大利亚等亚欧国家或地区,^[39]但组织者将中国环境史确立为会议研讨主题,反映了日本学界对中国环境史的高度重视。最后是原宗子、村松弘一、平势隆郎等学者的相关研究。^[40]

(三)2010 年日本环境史研究会成立后的研究

该会是日本学界专门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团体,自成立到 2019 年 3 月,先后召开了 22 次环境史研

讨会,其中9次出现过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内容,12人次作了大会报告,涉及气候、水资源、土地、林木、绿洲、农业、区域开发、资源,以及中国环境史研究状况等。^[41]报告者中,不乏长期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者,如原宗子、村松弘一等;而其报告的选题或内容,有些则为地球研支持的研究项目。如2011年第6次研讨会上中尾正义所作的《绿洲之水干涸之际》报告,就是前文所及地研所研究项目的成果。^[42]然而,随着2021年11月日本环境经济史研究会的成立,此后日本的环境史研究学术活动,似乎与经济史研究合并开展,尽管该会公开的资料中所见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术活动极为罕见,^[43]但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仍在持续推进,^[44]而且中国环境史也成为日本学界中国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如2022年出版的《论点·东洋史学》一书,共集结了日本148位历史学者撰写的有关亚洲、非洲历史的158个问题及学术论点,在其第一部分“文明与国家的形成”中,就有“环境变化与中国古代史”一则问题,^[45]表明中国环境史研究已在日本史坛占有一席之地。

三、相关述评

(一)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1960年代环境史的兴起,是学术界对西方工业化环境后果的回应。几乎同时,海外学界对中国环境史也有所涉猎,但尚未引起广泛关注,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专门性研究著述寥若晨星;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生态后果凸显,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史兴起的助推,海外学界对中国发展中的环境问题颇为关注。1990年代在香港召开的中国环境史学术研讨会,就聚集了海外诸多研究者。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自此进入了全面兴起的阶段,研究者、专门性研究成果数量日增,并且一些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术著述也对此有所关注,将环境史作为其论著内容的一部分。同时,一些步入史学殿堂的莘莘学子,纷纷将中国环境史作为其学位论文的研究选题。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可谓“欣欣向荣”。

(二)研究动因

目的决定动机。粗加概览,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动因主要有三:

1. 资鉴,就是以中国历史环境为例,为其现实主张或方案提供历史依据。如比尔斯基认为,尽管中国环境危机发生在2000年前,古代中国与现代西方也时空相差甚大,但前8—前3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在人口增长、商业社区出现、新城市大量建成、市场和贸易扩张等“许多方面”与现代西方“相似的发展时期”,并都“陷入了威胁我们的同一种生态危机”。充分利用传统中国留下的“足够多的历史记录”,对古代中国生态危机“完整的案例”进行研究,重建传统中国环境“危机的原因和应对措施”,并将“这一经验”运用到“当代场景”,以中国为“榜样”,充分了解人类行为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不仅有助于西方发展避免“重蹈中国早期历史的覆辙”,而且也为其解决“当前的担忧提供新的视角”。^[46]

2. 认识和理解当下中国环境问题的由来,进而对中国现实环境问题进行批判。如伊懋可就称其研究中国环境史的目的,即“为考察今日中国逐渐形成的环境危机提供一个视角”;^[47]《中国季刊》编者在1998年特刊发表伊氏的中国环境史论文时,明确指出刊发该文就是“为了了解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历史根源;穆盛博明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中国当代所面临的环境挑战”动因和动机,认为“当我们与不断加剧的全球生态危机作斗争的时候,那些历史遗留问题将左右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抉择”;^[48]易明则称,中国当代环境危机既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也是经济扩张的产物,并对中国一味发展经济而“很少考虑建立保护环境体制”等进行了间接的批判。^[49]

3. 弄清中国历史环境的真实情状。主要是年轻学者对此前学者借鉴、溯源和批评目的驱动下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结论有所质疑,并在基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广泛参阅文献的基础上,出于厘清中国环境真实情况的目的而开展研究,得出了异于前人的研究论断。如孟一衡 2020 年出版的专著以中国杉木为例,从环境史的视角,考察了历史林木利用及其相关社会经济问题,得出了与伊懋可中国古代“大毁林”及其导致的中国数千年“不可持续增长”迥异的结论,从而对传统中国的“大造林”及其在“限制”中国环境“灾难”发生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积极的评价。评论者认为,这一研究不仅“修正了伊懋可关于前现代中国持续毁林的叙事”,而且也“颠覆”了西方“把中国历史看作森林锐减的故事的认知”。^[50]

(三) 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

以 1990 年为界,可将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分为前、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相关成果如农业经济、水利建设等内容,尽管与环境史相关,但其研究主要隶属于地理学史、社会经济史、科学技术史等领域,而非真正意义的环境史研究,专门性环境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究其因,一方面,和环境史研究尚未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如原宗子就曾指出,早期日本学界普遍存在的“环境史不过是社会经济史的一个分野,而且,只是一类流行的东西,还没有实质的意义”认识,日本彼时“专门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罕见。^[51]另一方面,与这些研究者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目的有关,这在日本早期的研究中同样表现明显。其他如段义孚的环境思想史研究,即属人文地理学范畴;埃克霍姆基于粮食生产系统毁坏的研究,虽对中国林木资源利用与保护进行了考察,然一则其研究从农业生态视角展开,二则其著作内容涵盖全球灌溉、渔业、土壤等,而关于中国的研究仅限于森林资源。后期以 1990 年伊懋可的《中国环境史:观念的议程》一文发表为标志,开启了海外全面研究中国环境史之门。此后,专门研究中国环境史的著述渐增,研究对象和内容也日益丰富,即便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也往往多从环境史的视角而展开;同时,一些中国历史文化类著述,也陆续将历史环境作为阐释中国传统的考量要素。

(四) 关于中国历史环境状况的论断

1. 环境破坏论。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虽有不同认识,但主流观点是破坏论,认为传统中国的环境破坏具有规模大、程度深、持续时间长、后果严重等特征。如早期日本学界的研究大都基于“环境破坏史”尤其是“森林破坏史”导向的研究;墨菲认为,中国集约式开发自然的历史悠久,对环境“改变的规模”,远较其间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并据《孟子》记载,称中国自铁器使用以来,“地表覆盖的森林渐次消失”,而且“现在仍然持续着”;^[52]伊懋可的研究则指出,帝制中国的发展,以损害环境为代价,中国环境因而是“前现代”世界变化最大之一者,现代初期中国环境的严重恶化,均有其必然。^[53]他甚至用“阿拉伯化”来描述中国长期开发的环境后果,强调前现代中国由于人口的增长和对森林、土地的开发致环境受损,经济增长因“锁定”在其技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中而不可持续。^[54]

持此论者常将历史问题与中国现实紧密相连,在得出中国具有破坏环境“传统”的前提下,就当代中国包括环境在内的事务进行评鹭,从而对中国环境等未来发展表示“担忧”。如休斯在其 2006 年面世的《什么是环境史》一书中,讨论了《孟子》牛山林木和孟子主张问题,认为孟子“建议谨慎地从事木材砍伐和树木种植”,显示了“防止木材浪费的智慧”。但同时,他将孟子主张与中国现代世界经济地位的稳固与否相联系,为此而援引顾立雅的话说:“如果中国人曾注意到了孟子在最后这一方面的劝告,那么,他们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地位就会稳固得多”;^[55]在其 2009 年出版的《世界环境史》著作中,他将牛山的林木砍伐情况进一步普遍化,称:“毫无疑问,在中国许多山都遭受了牛山一样的命运”,进而以秦汉人口增长、区域开发空间拓展、林木取伐,以及“随之而来的是继续数个世纪的水土流失以及

洪水灾害”为据,忧心忡忡地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几大文明中心当中森林退化最为严重的地区”。^[56]从本质上看,环境破坏论是人口、环境威胁论在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反映。^[57]

2. 积极的评价。在环境破坏论之外,尚有些许不同的认识,就是对传统乃至当代中国环境及其保护给予积极的评价。如埃克霍姆就对先秦森林管理和保护功效予以了高度评价,称“这一黄金时代产生了肯定是最早的‘山林局’”,并称赞了1949年以来中国的“森林更新”努力和成效。^[58]其“黄金时代”结论,自此为学界借用以评述早期的环境保护;^[59]美国年轻学者孟一衡摒弃西方先入为主、片面的“破坏”论研究模式,以客观的“中间路线”研究中国环境史。通过考察,他认为“在早期近代中国,人们通过实施新的复杂实践来促进森林种植,应对森林砍伐的威胁”。尽管其“过程并不容易,结果也并不完美”,但经过几百年努力建立起来的“造林体系”则有效地“限制了环境和经济的灾难”。并且中国这一“独特的森林管理体系”逐渐“传播到世界”,被西人誉为“现代林业制度的先驱”。其研究结论,根本上颠覆了西方森林“破坏”论的中国环境史认知,向世界表明“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管理具有惊人的创新史”;^[60]2018年,牛津大学出版了“人人必读系列”丛书,其中《中国的环境污染》一书作者加德纳就当代中国环境治理而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人所认为的“中国政府只关心经济发展而罔顾环境”的“过时”认识进行了“反驳”,指出中国政府的环境保护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72年,而且近些年来进一步加强了环保工作,采取了如碳交易等环境治理措施,表明中国的环境保护并非停留于口头,而是付诸实践,并客观地评价说,尽管这些“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成功地解决了国家污染危机”,但中国治理环境的决心毋庸置疑。^[61]

(五)海外研究存在的问题

1. 结论允当的问题。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海外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已甚丰繁,对中国环境状况及其保护的论说也不一;同时,海外研究者擅长或喜好的模式、理论建构和“主义”主张,在与中国环境史紧密相关的研究或讨论中也有所反映,具体如大田谷作主义、齐国《管子》模式、秦国《商君书》模式、技术锁定、高水平陷阱、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发展、大毁林与大造林等等。就学术探索而论,这些结论或认识,对启发学人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思考、丰富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内容等,都具有不可否定的价值。然而,相关论断是否符合中国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是学界需要认真对待的基本问题。譬如拉兹洛认为,古代“中国的居民,不可能想到生活的基本需要,……会将周遭环境消耗殆尽,或是会被垃圾与废物污染”,但同时强调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很多地方的人类社群都对环境深怀敬意,尽可能只用大自然可以再生的资源”。^[62]其逻辑难以自洽,同时自相矛盾;又如易明称中国有“破坏环境的传统”,“更严重的是,中国缺乏任何有约束力的环境保护意识。而且,中国的观念、体制和政策都是在传统的认识和哲学,比如儒家思想中形成的,而儒家思想常常激发人的需求,从而役使自然,获取利益”。^[63]其认识与国内学界有关我国历史环境的基本判断相去甚远,是典型的“环境破坏论”或“环境衰败论”“环境恶化论”。

作为学界对社会批评工具的“环境破坏论”或“环境恶化论”,滥觞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直接用环境恶化论者的方式进行写作”和对包括如“古代和现代滥砍滥伐的程度”等论题在内的环境破坏“进行一个评估”的研究模式,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推动环境史研究“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进而“成为专业历史学领域中发展最快的分支学科之一”局面的形成,具有积极之功。然而,当“构成环境史内容的都是清一色乏味且重复的有关灾难”“写作风格”“积渐而至”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主流观点时,“环境破坏论”难免沦为环境史研究的“陷阱”。^[64]学术界对此已有辨析。^[65]因此,包括伊懋可的中国3000年“不可持续增长”、墨菲的中国环境战国以来“森林渐次消失”而且“现在仍然持续着”的“环境堕落”

等在内的认识,是学术界需高度警惕的环境史研究“陷阱”。其结论既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相悖,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中国历史环境的变迁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区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非简单的主观判断能够解释的。

2. 研究固有的不足。海外以欧美、日本学者为主的中国环境史研究,因视角、思维模式等差异,其有些成果或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由于文化隔膜、语言文字障碍、社会体验和价值判断差异等众多主观客观因素使然,海外学者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体悟与认知、古文献的广泛梳理和深度解读、史实的准确判断与正确理解等方面,都常难如人意,乃至存在误读、误解、误判等缺憾。因此,海外有些中国环境史研究成果貌似新颖,但稍加寻究,即不难发现其论证粗疏、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差错乖疏甚至自相抵牾等不足。例如墨菲在没有任何证据和论证的情况下就认为“中国长期对原始环境渐进的人为破坏经验,是其他亚洲季风地区所少有的”:旧石器时代,“为薪伐木与焚林助猎,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开始改变旧石器时代的环境”;新石器时代,中国“已开始从渔猎和采集转为农耕”,“农业的来临,意味着人口繁衍,并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形成了“基本的且总是破坏性的冲击”;而自战国以来,中国森林“渐次消失”,直到“现在仍然持续着”。^[66]在他看来,旧石器时代迄今,中国环境始终遭“破坏”,但缺乏必要的文献支持和充分的论证,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3. 文化的偏见和标准的双重。受“西方中心论”影响,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时,常基于西方价值观开展研究和作出判断,其结论或言论不可避免地存有如“文化的偏见、理论的执着以及双重标准”等痼疾。^[67]如伊懋可在阐述中国发展的“高水平平衡陷阱”时认为,“减轻并且打破中国的‘高水平平衡陷阱’,是近代西方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而他所谓的“历史贡献”,竟是 19 世纪中期以来外国势力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的开辟及其所致的中国被迫“向世界市场开放”后,由于外国技术和机器的引进,“培养了中国人的近代技术技能”及其为中国近代企业奠定的“基础”。^[68]将近代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美化为中国发展的“贡献”者,属典型的“站在本民族历史经验的背景中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现象”,^[69]是“西方中心论”对历史研究的渗透。^[70]具体到中国环境史研究,可以马立博“中国人的消费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的相关论断为例。论者在考察 16—19 世纪中国贸易发展时认为,中国人的檀香、毛皮、鸦片消费需求,是引发太平洋岛国和部落大肆砍伐檀香树、俄罗斯探险者进入西伯利亚捕猎紫貂与狐狸、美国西海岸猎人宰杀海獭与海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南亚大量种植鸦片等事件的诱因,并进而导致檀香树在夏威夷绝大部分地区“几乎绝迹”、紫貂从西伯利亚的很多地区“消失”、美国西海岸地区海獭种群“面临灭绝”、南亚地区种植鸦片带来的生态“影响”等全球性环境后果。^[71]其论断涉及特殊物品消费对动植物资源的影响、特定植物种植的环境后果两方面问题。关于前者,早在 30 余年前,英国学者庞廷在其英文著作《绿色世界史》中即有所论述,但其观点与马立博完全不同。庞廷认为,西伯利亚貂狐皮毛主要销往欧洲,而且“对皮毛的追逐就是欧洲人在(北美)这个大陆四处扩张的内在驱动力”,欧洲商人在北美“没有限制性”的捕杀,“很快地耗尽北美海狸、海獭等资源,最终导致其在北美各地的相继灭绝”;^[72]至于后者,则更为显然,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种植、贩卖和获利者,均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中国是受害者,而在马立博的著述中,中国却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与国人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堪谓霄壤之别。马立博的论断,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缺乏深刻认知和价值判断有关。史密斯就曾指出美国“很多人听说过鸦片战争”,但对这一“中国的‘百年国耻’”“有深入了解的人不多”的认知情状。^[73]

(六) 环境史研究话语权的建构:国内环境史研究的任务

17 年前,原宗子即说,“环境史不仅对于既成历史学发起了挑战,还可以对当今人类的知识以及

价值观体系,进行积极的改善、改良与完善。”^[74]表明在海外学者看来,环境史研究不完全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更是关涉知识、价值观体系及其“改善、改良与完善”;10多年前,在2012年的武夷山“环境史研究高层论坛”圆桌会议上,美国学者沃斯特发出了“中国学界对于世界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在哪里”之问,^[75]对中国学者在全球环境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提出质疑。然而,及至今日,我们不仅对环境史研究在价值观体系方面的作用未曾予以高度的重视,而且即便是中国环境史研究,国内学者在海外的声音和影响都十分有限,遑论所谓对“世界环境史研究的贡献”。此其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环境史研究还存在奉西方史著为圭臬的倾向。^[76]如所周知,海外学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主要基于其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理论思考、学术背景、思维模式、学术关怀和现实观照等多种要素而展开,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但不足乃至谬误也十分常见,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对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相关论断加以认真辨析,并充分吸收、借鉴海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对西方本位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加强和深化中国环境史研究,形成自己的环境史研究话语体系,构建并牢牢地掌握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话语权,进而用中国环境史的本土话语影响海外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从而对“沃斯特之问”作出积极的回应。

注释:

- [1] 濮德培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现状及趋势》一文(《江汉论坛》2014年第5期)曾对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概况进行了极其简略的勾勒。
- [2] [加拿大]O·P·德怀维迪:《政治科学与环境问题》,王爵鸾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陈栋生:《开展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经济学动态》1979年第7期。
- [3] 曾华壁:《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第23卷,1999年;[美]J.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 [4] 刘晓玉:《基于政策过程的中国环境问题研究——海外学界的视角》,《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 [5] Rhoads Murphey, “Man and Nature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1967, 1(4), pp. 313 - 333.
- [6] Yi - Fu Tuan, “Discrepancies between Environmental Attitude and Behaviour: Examples from Europe and China”, *The Canadian Geographer*, 1968, 12(3), pp. 176 - 191; Yi - Fu Tuan, “Our Trea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in Ideal and Actuality”, *American Scientist*, 1970, 58(3), pp. 244, 247 - 249.
- [7] Keith Buchan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arth: Aspect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Earth from Earliest Times to Mao Tse - tung*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70, p. 81.
- [8] Michael Freeber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arth. By Keith Buchanan”, *The China Quarterly*, 1971, 45, pp. 178 - 181.
- [9] [58] [美]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 and 世界粮食前景》,黄重生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5 - 16、29 - 30页。
- [10] [17] [46] Lester J. bilsky, “Ecological crisis and Response in Ancient China”, Lester J. bilsky, *Historical Ecology: Essayson Environment and S - ocial Change*, New York: Kennikat Press Corp, 1980, pp. 60 - 70, 60 - 62, 70.
- [11] [英]李约瑟:《植物学》,《生物学及相关技术》第1分册,《中国科学技术史》第6卷,袁以苇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3 - 49页。
- [12] Peter C. Perdue,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 - 18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3] 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
- [14] J. Donald Hughes, “Mencius’ Prescriptions for Ancient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Review*, 1989, 13(3/4), pp. 15 - 27.
- [15] Mark Elv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An Agenda of Ideas”, *Asian Studies Review*, 1990, 14(2), pp. 39 - 53.
- [16] [64] 参见[美]约翰·麦克尼尔:《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回顾》,王晓辉译,刘新成:《全球史评论》第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 - 49页。
- [18] 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统计资料汇编(1981 - 1990)》,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6 - 58页;黄继忠:《中国乡镇企业启示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40、161 - 162页。

- [19]李周等:《中国环境问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46页。
- [20]曲格平:《困境与选择——中国环境与发展战略研究》,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
- [21]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内容摘要”。
- [22]全球史兴起与环境史的关联,可参见钱晓鸿:《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2-7页;蒋竹山:《探寻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研究趋势与实践》,《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 [23]刘翠溶:《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
- [24]Mark Elvin,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 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 *East Asian History*, 1993, 6, pp. 7-46.
- [25][美]孟泽恩:《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赵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Mary Evelyn Tucker, *Buddh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connection of Dharma and Dee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y Evelyn Tucker, et al.,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Girardot, et al., *Daoism and Ecology: Ways within a Cosmic Landsca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美]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王玉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 [26]Richard Louis Edmonds, “Studies on China’s Environment, Mark Elvin, The Environmental Legacy of Imperial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8, 156, pp. 725-732, 733-756.
- [27]Caroline Blunden, et al., *Cultural atlas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Checkmark Books, 1998, pp. 44-46; Michael Loewe, et al.,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0-36.
- [28]尚未汉译者有: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Ling Zhang, *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Daniel Gardne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29][英]迈克尔·威廉斯:《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马宝建等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辑。
- [30][36]陈祥等:《日本环境史研究会的学术对话与史学研究创新》,《日本文论》2021年第2期。
- [31][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册,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5-124页;[日]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45-286页;[日]佐藤武敏:《古代における江淮地方の水利開発——とくに陂を中心として》,《人文研究》第13卷第7期,1962年;Elvin, Mark, et al., *Japanes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 Control in China—A Selected Bibliography*, Canberra: The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of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4。
- [32][日]福士由纪等:《日本中国环境研究回顾》,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现代中国区域研究项目:《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3-170页。
- [33][日]原宗子:《古代中国の開發と環境——〈管子〉地員篇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94年;[日]原宗子:《“農本”主義の採用過程と環境——古代中国における“共生”への一つの道》,《史潮》新40号,1996年;[日]上田信:《森と緑の中国史》,东京:岩波書店,1999年;[日]村松弘一:《中国古代関中平原の都市と環境——咸陽ら長安へ》,《史潮》新46号,1999年。
- [34][51][日]原宗子:《在日本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李根蟠等:《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
- [35]原宗子把在自然条件许可条件下尽可能地大面积开垦土地和种植粮食作物,并以其作为主食和课税品的经济形态称为“大田谷作主义”。参见[日]原宗子:《我对华北古代环境史的研究——日本的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之一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 [37]沿革[OL], (日本)総合地球環境学研究所网, <https://www.chikyu.ac.jp/rihn/about/overview/>。
- [38]過去の研究, (日本)総合地球環境学研究所网, <https://www.chikyu.ac.jp/rihn/activities/cr/>。
- [39]陈建明:《探寻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视野——“对大地的影响:中国近期环境史”国际研讨会综述》,《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
- [40][日]原宗子:《“農本”主義と“黄土”の発生——古代中国の開發と環境2》,东京:研文出版,2005年;[日]村松弘一:《中国古代の山林叢澤——人間は自然環境をどう見たか》,《學習院史学》第43卷,2005年;[日]平势隆郎:《中国戦国時代の国家領域と山林叢澤論》,松井健:《自然的資源化》,东京:弘文堂,2007年,第27-82页。
- [41]Activities[OL], (日本)環境史研究会网, http://dlpweb.ed.kagawa-u.ac.jp/main/?page_id=20。
- [42]2006年度終了プロジェクト[OL], (日本)総合地球環境学研究所网, <https://www.chikyu.ac.jp/rihn/activities/project/detail/64/>;環境史研究会第6ワークショップのご案内[OL], (日本)環境史研究会网, <http://dlpweb.ed.kagawa-u.ac.jp/main/?m=>

201107。

- [43]“环境经济史研究会”発足会ならびに合評会のご案内[OL],(日本)环境史研究会网,<http://dlpweb.ed.k.agawa-u.ac.jp/main/?m=202111>。
- [44]其重要成果有如村松弘一的《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等(村松弘一:《中国古代环境史の研究》,东京:汲古書院,2016年)。
- [45][日]石川博树等:《论点·东洋史学》,郑天恩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23年。
- [47][英]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序”,第6页。
- [48][美]穆盛博:《追溯中国环境问题的前因后果》,“中外对话”网,<https://chinadialogue.net/zh/6/43356/>。
- [49][63][美]易明:《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姜智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
- [50][60][美]孟一衡:《杉木与帝国:早期近代中国的森林革命》,张连伟等译,上海:光启书局,2022年,“中文版序言”、“序:大造林”。
- [52][66][美]罗兹·墨菲:《在亚洲比较观点下的中国环境史》,《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84页。
- [53]Mark Elvin,“The Environmental Legacy of Imperial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1998,156,pp.733-756。
- [54]Mark Elvin,“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East Asian History*,1993,6,pp.7-46。
- [55]《什么是环境史》,第21-23页;Herlee G. Creel,*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se-tung*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82。
- [56][美]J·唐纳德·休斯:《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变》第2版,赵长风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76、80页。
- [57]叶淑兰等:《西方媒体“中国环境威胁论”话语建构探析》,《国际论坛》2015年第6期。
- [59]曲格平等:《中国人口与环境》,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页。
- [61]Daniel K,Gardner,*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p.165-168。
- [62][匈牙利]欧文·拉兹洛:《巨变》,杜默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 [65]参见侯甬坚:《“环境破坏论”的生态史评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 [67]汪荣祖:《新时代的历史话语权问题》,《国际汉学》2018年第2期。
- [68][英]伊懋可:《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王湘云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315页。
- [69]包伟民:《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法论刍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3期。
- [70]“西方中心论”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可参见顾奎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 [71][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1-296页。
- [72][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0-204页。
- [73][美]劳伦斯·C.史密斯:《河流是部文明史》,周炜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年,第92页。
- [74][日]原宗子:《中国环境史在建立新世界历史中的任务》,夏炎译,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51页。
- [75]许博:《“环境史研究高层论坛”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3期。
- [76]焦润明:《环境史学论要》,《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责任编辑:陶婷婷]